

周易图象学思潮（下）

李 申

六、宋明以来作图风

宋明以来，以河图、洛书，先天图，周氏太极图，阴阳鱼图为骨干，形成了一股以图解易风。

刘牧《易数钩隐图》共有图55幅，大约是为了和天地之数相应。他把卦爻转化为数，数用黑白点表示，用线把黑白点联系起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黑白点的关系，就是数的关系，卦爻的关系，因而也就是《周易》的道理。把抽象的哲学道理变为数与数的关系，进而变为简单的符号，其实是个比较新颖的思想。但刘牧的思路没能在易学以外结出果实，只在易学以内开创了新风。

河图、洛书之外，就是邵雍的先天图和周敦颐的太极图。南宋初，朱震作《汉上易传》，有《卦图》三卷。据《宋史·艺文志》，或在朱震之前，或在朱震之后，有叶昌龄《图义》二卷；李平西《河图传》一卷；李遇《删定易图论》六卷；吴仁杰《周易图说》二卷；孙份《周易先天流衍图》十二卷。那些未专以《周易》为名或未加“易图”字样的著作，也有图。如杨甲《六经图》，有易图70幅，大约在元明时代经人补缀，易图增至130幅。张浚的《紫岩易传》，林栗的《周易经传集解》，程大昌《易原》，程迥《周易古占法》，都有图，或与河图、洛书等易图相关。比如林栗《集解》内有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大

衍总会图、六十四卦立成图等；程大昌《易原》，“首论五十有五之数，参以图书、大衍，为易之原”（《四库提要》）。程迥《周易古占法》画一圆，下半黑而上半白，表示乾坤如鸡子。朱熹《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出世以后，易学著作大都要附上河图、洛书及先后天图等等。许多易学著作甚至是专为解释、论证程朱的《易传》、《本义》。如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董楷《周易传义附录》等等。有些易图在河洛、先天、太极之外，也另有创新。如林至《易裨传》，图解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就多少有自己的新意。

宋代人创造易图，导源于图解《周易》及其有关的义理，即图解《周易》及其有关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们把河图、洛书说成是卦象的渊源，把先天图说成是伏羲所画，实际上它们都不过是对《易传》中某些条文的图解。比如先天图不过是图解“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等等。至于周敦颐太极图，实际应叫太极生成图，或宇宙演化图。因为它不仅包括了《易传》太极生两仪等思想，还揉进了五行化生思想。

《周易》卦象，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图。所以在河洛等易图兴起以后，为了说明爻象、卦象之间的关系，又大量兴起了卦图或卦变图。卦变图的出现，使卦象结构、卦爻关系一目了然，也使象数派省却了许多文字说明。以数量上说，卦变图的数量可能要多于讲义理的易图。后世甚至有人认为，易图就是卦图，卦图之外不应再有什么易图，如吴仁杰的《易图说》主要是说卦图。然而，只有河洛、先天、太极等图才是易图的核心，并促进了易学新派别图象派的兴起。

河洛是为解释卦象渊源而作。先天、太极则是为阐明《周易》的某些道理，《周易》的道理又是从阐释卦象而来，因此，阐明卦象与河洛、太极诸图的关系，也是图象派的重要任务。把河洛和卦象相配，把太极图的道理转化为卦象之间的关系，有相当

多的易图属于这一类，它们介于卦图和太极、河洛之间。

《易传》上说，卦象是从仰观、俯察而来。因此，卦象和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象征和被象征的关系。人们也往往从某一个方面去理解这种关系，并且自认为自己才找到了卦象的真正根据，解开了千古不解的易学之谜。宋代林光世作《水村易镜》，认为当时的易学家都丢掉了仰观、俯察说，于是他长期仰观天文，“发现”星象中包含着六十四卦，就把卦象和星图相配。《四库提要》批评说：“自古说易之家，未有纰缪至此者。”后来，陈图作《周易起元》，又用名山大川和卦象相配。

《四库提要》慨叹道：“殆不至以鸟兽配卦不止矣。”《四库提要》的批评，说明在宋朝末年，图象派的牵强附会也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

大量图象的产生，引起了关于图象问题的讨论，争论又主要集中在河图、洛书的真伪上。由于蔡元定、朱熹的支持，河图55点，洛书45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是，拥护刘牧的仍然不乏其人。朱熹以前，朱震拥护刘牧；朱熹以后，朱元升《三易备遗》等仍以45点为河图，55点为洛书。所以元代胡一桂《易学启蒙翼传》慨叹：“去朱子才百余年，而承学渐失；如图书已釐正矣，复仍刘牧之谬者有之”（《易学启蒙翼传·序》）。所以他努力辨别河图、洛书的异同，以证明朱熹的正确。而在刘牧、朱熹之外，宋元之际还有俞琰继欧阳修、薛季宣之后，对黑白点河图再次发出非难，认为《尚书》所说的河图只是一种玉（见、俞琰《周易集说》）。正是这种对河图、洛书的非难和讨论，才使吴澄去极力弥缝，把河图说成马旋毛、洛书说成龟背坼文；谢枋得、罗愿、赵抃谦等才企图另造河图。直到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后裔朱谋埈作《周易象通》，又造了四幅河图，说是三代以来一直为皇室秘藏，到宋徽宗时方才出世。比起蔡元定入蜀得之隐士，朱谋埈的说法就更加难以令人置信了。

元代重要的易图学专家是张理，据前人考证，《正统道藏》中《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及《易象图说》，均为张理的作品。其中《周易图》约有图102幅，《钩深图》约140余幅，《易象图说》也有四五十幅。除去重复，可算是集宋元时期易图的大成。这些易图不仅解释《周易》自身的道理，而且企图函盖《周易》之外的一切，如“四象八卦六脉图”讲卦象与脉象，“四象八卦六节图”讲卦象与气候，“四象八卦六经图”讲卦与六经；“四象八卦六师图”讲卦与八阵图等等。

明代由于《周易本义》成为官方颁布的定论，宋濂以后，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图的真实性。学者们多是讨论、阐发太极图、河图、洛书的意义。明初的学者曹端、薛瑄，都把讨论太极图等，作为他们重要的学术活动。他们也深信，河洛先天诸图是古圣人的遗物，只是秦汉以来失传了。薛瑄说：

自秦汉以来，不知自何时，易之图象不传于世。如王辅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贞”以下，皆不论其图象，至邵子得先天图于希夷，而后图象始明（《读书续录》卷1）。

因此，明朝的易学家，以更深的虔诚，更大的热情，投入了阐释易图的事业。从《四库提要》所说，可见明代作图风的一斑：

《周易旁注图说》，明朱升撰。“上篇凡八图。……仅敷衍陈抟之学”。

《学易象数举隅》，明汪敬撰。“其书专明象数，自天地自然之易，至邵子《经世书》，全数皆列图于前，而系说于后”。

《图学纪愚》，明阮琳撰。“其书首载太极河洛诸图，次及六十四卦横方图，终之以五行生剋”。

《易图识漏》，明黄芹撰。“是编为发明先天图学而作……易图凡二十七面……坚信先天图出自伏羲，推而至于心学，推而至于历法……”

《图书质疑》，明薛侃撰。“前列卦位河图太极洛书等十三图，图各有说……其大旨谓即数为图，即图成卦，皆造化自然之理”。

《易辩》，明丰坊撰。“其论《太极图说》，谓朱子得自葛长庚，托名周子”。

《易经中说》，明卢翰撰。“立图太多，每成蛇足……理本简易，图反治丝而纷之”。

《续韦斋易义虚裁》，明涂宗濬撰。“其首列易图，以河图作旋毛，洛书作坼甲，盖本吴澄之说……”。

《像抄》，明钱一本撰。“其卦图以朱子《本义》所列九图衍为三十二图”。

《易学残本》，明卓尔康撰。“其首列为起数之根者，有古河图，古洛书……”。

《易图亲见》，明来集之撰。“为图四十有五”。

《河洛定议赞》，明喻国人撰。“自以为河洛之议，至此书而始定，书成且祭河洛之神及天地四圣，为文以告。其诞至此，又何异于中风狂走者乎！”

……

上述不完全的摘录，已可见明代作图风的盛况及荒诞离奇的程度。他们不仅用图解易，解天文地理，而且解心身性命；他们不仅信奉河洛先天，而且自造河图、洛书。明朝人造的河图、洛书，大多没传留下来，只有阴阳鱼图，被后人当成了太极图。

继阴阳鱼图之后，来知德创造了他的圆图（图十六），后来也被称作太极图：

来知德盛赞自己的图道：

此圣人作易之原也。理气象数，阴阳老少，往来进退，常变吉凶，皆尚乎其中。孔子系易首章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及“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形上”、“形

图16
未知德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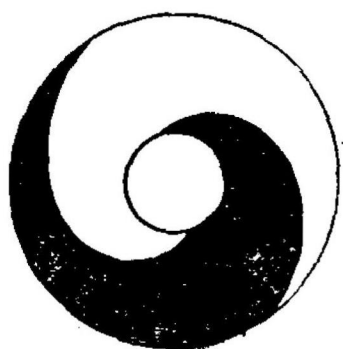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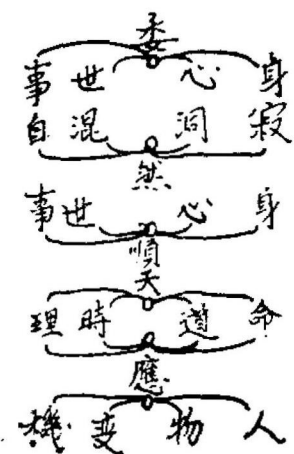
图17
李道纯中和图

圖和中



图18
李道纯委顺图

圖順委



李道纯委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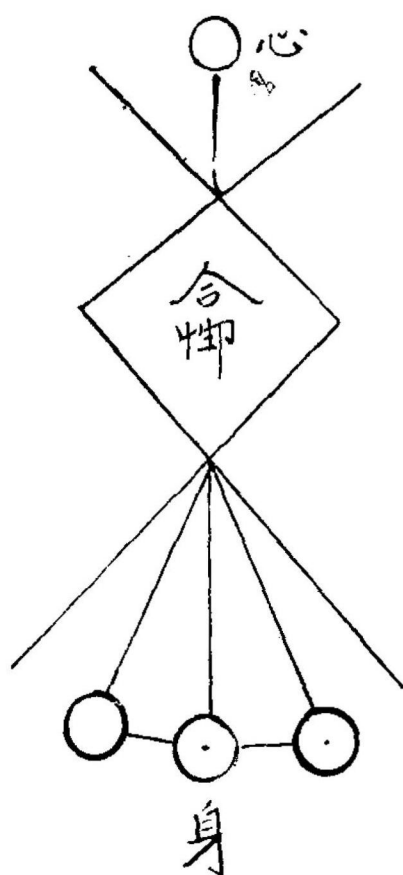


图19
林兆恩心身性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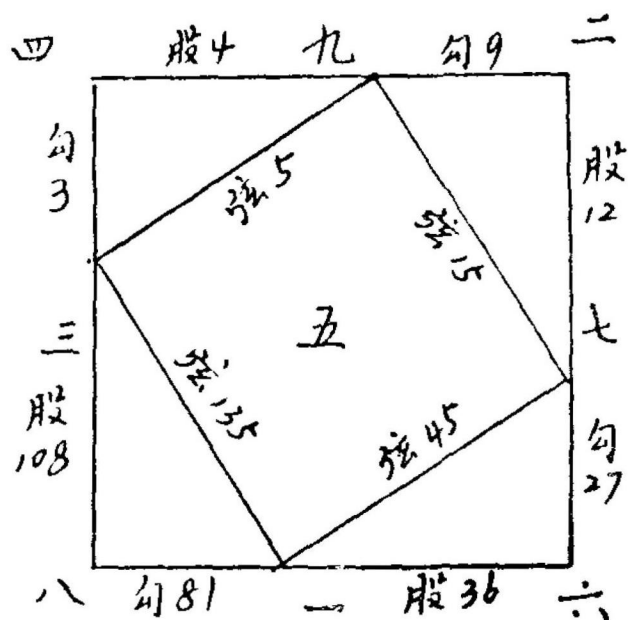


图20
李光地洛书勾股图

下”数篇，以至于“幽赞于神明”一章，卒归乎义命，皆不外此图。神而明之，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于我矣（来知德《周易集注》）。

依照他自己的理解，来知德把他的图和气候、天地形象、历代帝王、文章、人材，和三教等配合起来。甚至认为：“世道之治乱、国家之因革，山川之兴废，王伯之诚伪，风俗之厚薄，学术之邪正，理学之晦明，文章之淳漓，士子之贵贱，贤不肖之进退，华夷之强弱，百姓之劳逸，财赋之盈虚，户口之增减，年岁之丰凶，举辟之详略，以至一草一木之贱，一饮一食之微，于此图见之矣”（《易经来注图解·来图补遗》，巴蜀书社，1988年）。由于阴阳鱼图的流传，来知德的图也未能流传下来。

易图之外，宋明时代的人们还造了许多阐明各种义理的图。如李道纯《中和集》有“中和”、“委顺”等图（图十七、十八）：

“中和图”表示“未发谓之中”及“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为的是让人“致中和”。“委顺图”是教人摆脱“身心世事”的“紫绊”。

三一教主林兆恩，也用图来阐明他的教义。他的“心身性命图”（图十九）表示，性命从心出，易的爻也从心出。性命居于爻中，表示未发之中，天人之道具备于此，仁义礼智由此产生。

“即此为学，便是天德；即此为治，便是王道”（《三教正宗统论·心身性命图说》）。

宋明时代，类似的图象，成百上千。这些图象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易图有关。因此，用图象表示哲学义理的思潮，我们称之为《周易》图象学思潮。

七、易图论争与《易图明辨》

宋代图象学思潮，否认了欧阳修及薛季宣的意见，坚信河

图、洛书是存在的，所争仅在于哪个是河图，哪个是洛书？对于先天图，程颢为邵雍作墓志铭，已指出它的传授远有端绪。其后邵伯温的《易学辨惑》，又将其父邵雍的传授系统追溯到陈抟。朱熹又指出陈抟所传是“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朱子语类》卷65）。先天图的传授遂成定论。周氏太极图，除了陆九渊援引朱震，指出它来自陈抟，为“老氏之学”以外，还无其他较有份量的说法。

争论易图的传授，不仅关系着易图作者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在于易图的价值。

朱熹说先天图来自陈抟和《参同契》，但仍把先天图放在《周易本义》卷首。因为在宋代人眼里，一般并不认为陈抟和《参同契》是异端。所以朱震不仅把河洛、太极、先天诸图的传授都归于陈抟，而且还指出二程、邵雍张载的学问渊源也是陈抟。那意思是说，周敦颐、二程、邵雍他们各执一端。而他自己，则要“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并採汉唐以来的意见。”“包括异同”，使“道离而复合”（《宋史·朱震传》）。也就是说，他要作第二个陈抟。

随着理学思想统治的加强，陈抟和《参同契》逐渐被看作异端。元代陈应润作《周易爻变易缙》，其中指出，周敦颐太极图“杂以老子之学，失大传之本旨”，先天图是“以丹经之学，撰先天之图”（《周易爻变易缙·序图说》），是“变炉火之术以撰先天后天之图”（《周易爻变易缙·序》）。他重绘了太极图，抛弃了先天图，并认定后天方位就是伏羲所定的方位。《四库提要》称赞说：“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钱义方的《周易图说》和陈应润一样，并不否认河图、洛书是黑白点，但钱义方认为，所谓“圣人则之”，只是则河图以揲蓍，并非则河图以画卦。

明初自宋濂否认黑白点河图、洛书以后，反对易图的声音就

沉寂了。直到明朝后期，归有光才又公开指出：“易图非伏羲之书”，“乃邵子之学”（《震川集·易图论》）。归有光说，伏羲氏仰观、俯察以画八卦，因此卦象象征着一切事物，“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阴阳术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都可说是易。但他认为，只有八卦到六十四卦才是易的正宗。伏羲方圆图之类，虽不违背圣人的意思，但不是易的正宗。他还得出结论说：“虽图与传无乖刺，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震川集·易图论》）。

图是对传的图解，传不是图的解说，这是归有光得出的最正确的结论。

明朝灭亡之后，明朝遗民总结明亡的教训，大多归因于王守仁心学。但是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认为自己的学说和程朱的精神完全一致。所以批判王学，就不能不想到程朱。由于朱学在清代仍是官学，不能批判，所以有些人就从学术渊源上对程朱理学进行清算。阎若璩证明，《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从而使“十六字心传”失去了神圣根据。在追查宋学渊源的时候，易图自然也受到了注意。

朱熹把周敦颐推为理学开山祖师，又说太极图是周敦颐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毛奇龄说，周氏太极图源于《道藏》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黄宗炎说，太极图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无极图。虽然《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出于周敦颐之后，黄宗炎的说法近似神话，虽然后来的乾嘉学派精于考证，甚至支离繁琐，考至于不可考，对于太极图渊源这样重大的问题，却无人化力气去考证毛奇龄、黄宗炎的结论。因为他们对宋学好感不多，所以欢迎这些揭露宋学弊病的言论。

毛奇龄又作《河洛原舛编》，认为当时所传的河图，不过是对郑玄注“大衍之数”的图解。他认为：“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而稍早于毛奇龄的黄宗羲则认为，图是

“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书是“风土刚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易学象数论》）。

在对易图热烈讨论的情况下，胡渭完成了他的《易图明辨》。《易图明辨》广泛搜集了从古以来讨论易图的文字，并一一加以辨正。胡渭不同意黄宗羲、毛奇龄把河图、洛书说成是山川地形之图，风土户口之书，但他和黄毛一样，也不相信河图、洛书就是那些黑白点。他认为河图、洛书不过是一种祥瑞之物，且在周室东迁时已经失落，已无法追寻它们的原貌。所以他认为，谈论《周易》不必谈河图，就象吃肉不必吃马肝一样。

胡渭称赞阴阳鱼图，认为“非窃窥阴阳造化之秘者亦不能为也”（《易图明辨》卷3），并且断定，陈抟传至邵雍的，就是这个图。他只是认为，不能把这个图说成伏羲则之画卦的河图。

胡渭说，秦汉以来，人们都不能说出河图的形状，到宋代突然出世了，这怎么可信呢？然而“学者不能痛绝图书之谬种，而徒辨刘蔡之是非”，他认为这是些无谓的争论。他指出：“宋人之所传，一概难信”（《易图明辨》卷5）。

胡渭直接批评朱熹，说他不该明知《关朗易传》是伪作，而仍相信其中所说的河图、洛书。他两次引用朱子《答刘君房书》，试图证明朱熹晚年后悔自己不该把河图、洛书之类放在自己署名的易学著作之首。他因此说道：“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易图明辨》卷10）。并且认为：“邵子之易，与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易图明辨》卷10），他坚决主张屏绝九图：“非屏弃九图，则黄雾不披，青天白日终不可得而见也。”象宋儒攻击汉唐时代是“架漏过时”一样，胡渭也把易图当作遮挡阳光的迷雾。

八、清代的易学和易图

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学术方向，成了乾嘉学派的前

驱。他们不满宋学，提倡汉学。在易学方面，也提倡汉易，贬低宋代易学，尤其是继承胡渭的方向，主张摒弃易图。

清朝初年，在黄宗羲、毛奇龄、黄宗炎、胡渭等人以外，孙奇逢、王夫之、钱澄之、魏荔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对了易图学。王夫之不排斥黑白点河图、洛书，但严厉批评先天图是炉火丹鼎之术。孙奇逢的《读易大旨》，“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四库提要》）。钱澄之的《田间易学》不排斥易图，但他和钱义方一样，认为易图中的奇偶之数只是“揲蓍之法，非画卦之本”（《四库提要》）。魏荔通的《大易通解》，认为河图、洛书只是与画卦之理相通，不应穿凿附会。

清初反对易图的思潮给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李塉《周易传注》，援引毛奇龄、胡渭等人，“驳河图、洛书之说”，“驳先天八卦之说”（《四库提要》）。黄宗羲的学生查慎行，继续辨明易图的源流和意义。沈起元的《周易孔义集说》谓河洛先天诸图是“陈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从删薙”（《四库提要》）。朱轼《周易传义》，“称宋元以来，易图不下数千，于四圣人之精义，全无干涉，今一概不录”（《四库提要》）。而赵继序的《图书质疑》，虽讨论象数，却不讲河洛。他认为作图者本于易，而不是作易者本于图书。至于惠士奇、惠栋等人的易学著作，则专宗汉学。他们不仅排斥易图，而且排斥整个宋明易学。

从清朝初年起，也出现了几部御定的易学著作，其较有影响的《周易折中》，“冠以图说，殿以《启蒙》”（《四库提要》）。容忍了易图的存在。此外还有不少易学著作笃信易图。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采集朱熹、吴澄、张理、来知德等人的易图，加上他自己的创作，有图近百幅。并且认为：“爻本于卦，卦本于图，图本于河图、洛书”（《周易函书约存·图书与易相关说》）。他深不满于人们只解卦爻象辞而不顾图书。任启运的《周易洗心》，收集了朱熹，邵雍直到李光地、胡煦的易

图，并且认为，卦画出自伏羲的图，伏羲的图出自河图、洛书。所以解《易》应先研究易图。

明朝末年，为了修订历法，中国学者徐光启等人开始接受西方数学。在西方数学的刺激下，梅文鼎等人又燃起了整理中国古代数学的热情。清初康熙皇帝励精图治，也势力学习中西文化，其中包括中西数学。对宋学不满的学者们，主张回到六经。并且认为，要读懂六经，需要广博的知识，其中就包括数学。几种因素汇合起来，促成了清朝前期数学的发展。数学的发展影响到易学，易图也有了新特点。从李光地开始，用勾股、圆方等数学知识附会河图、洛书和易数，并认为大衍之数是勾股、圆方术之源，河图、洛书是加减乘除之源，并分别绘制成图（如图二十）。易图学得到数学的支持，又开了一个新生面。

《四库全书》作者认为不值得收入《四库全书》的，大量的易图学著作。据《四库提要》“易类存目”栏：

《大衍则通》，胡世安撰。“是书专主阐明图学”。

《周易明著录》，徐继发撰。“其书专以后天诸图为主”。

《羲画愤参》，陆位时撰。“其书专阐河洛之数”。

《读易近解》，汤秀琦撰。“是编取《周易图说》为之发明……旧有图者，因图而推衍之；旧有说而无图者，补图以证佐之”。

《周易蕴义图考》，姜兆锡撰。“是编主先天之学，皆根柢图书”。

《读易管窥》，吴隆元撰。“大抵力阐陈抟之学”。

《易韦》，朱襄撰。“卷首为易图说凡十二图，其以九数为河图，宗刘牧之说”。

《易学图说会通》，杨方达撰。“左图右说，集成八卷”，“专讲先天之学”。

《周易剩义》，童能灵撰。“其论易专主河图，以明象数之

学”。

《易准》，曹庭栋撰。“是书为图学而作”。

《易图疏义》，刘鸣珂撰。“是书因《周易启蒙》‘本图书’、‘原卦画’二篇之说而疏通其义”。

《易象图说》，吴脉鬯撰。“是书櫟括诸图，各为之说”。

《周易后天归图》，黎由高撰。“是书专明后天之易六十四卦反对之义，而一归之于图”。

《易经本义翼》，无名氏撰。“其书图说分六编”，“大抵以河洛之说辗转推衍”。

清代前期的易图学著作，不仅比明代规模更大，而且更加笃信易图源于圣人：

《周易疏略》，张沐撰。“……诸图仍列于卷首。其洛书条下注曰：圣人因之，以明吉凶。著于易之首，是竟以今本九图为孔子所定也”。

《周易象义合参》，吴德信撰。“自序称淮安舟次，中宵假寐，忽因刚柔相摩句，恍悟河图本有八卦，特假伏羲画出”，“真以为先有此五十五点黑白之图，伏羲乃因之作易”。

《易深》，许伯政撰。“是书以为图书皆出太昊之世，卦数生于河图”。

有些创作的易图，也更加荒诞离奇：

《周易起元》，陈图撰。“昔林至（注：应为林光世）《水村易镜》以卦配星，以为仰观天文；此更以卦配地，以为俯察地理”。“又经文之中多间以图，其图皆奇形怪状。如《文言传》‘见龙在田’节下，附一‘物欲所蔽图’。作纯黑壶卢形，上段分布五小白圈，中书‘人欲一萌，血自攻心’云云……下段则书‘欲海茫茫不计深，其中灼灼产黄金’云云……其图大抵皆类此，真不知意欲何为”。

《周易义参》，于琳撰。“末列三十三图，亦皆抄袭旧图而

小变其貌。其自作者，如在天成象图，以日星霞露虹左列为阳，以月汉风霜雪右列为阴，而以云雨雷电雾雹居中为兼阴阳，殊为无理。在地成形图，以水金山右列为柔，土火石左列为刚，木丝谷盐并列于中为兼柔刚，尤不可解，而成男成女图作⊙○之形，一阴一阳之谓道图又作○=⊙形，益怪诞矣”。

《大易阐微录》，刘瑄撰。“……推衍（先天之学）加以穿凿。如谓人之生虱，人止一个，而所生之虱个个有对。又谓男女虽是两个，合起来仍是一个。故男嫫女寡俗称半个人。其辞皆不雅训”。

《四库全书》完成以后，易学图象风似乎愈演愈烈。民国年间，杭辛斋的《易学藏书·图书》一节说道：宋以来的《易》注无图，邵雍、周敦颐的图和《易》注也不相属联，朱熹把易图放在《本义》卷首，《易》与图才相为附丽，以致此后的《易》注“无不有图”。清代汉学家虽力攻易图，但“为之图者”，仍“层出不穷”。他认为原因在于易图可使那些繁琐的卦变，搅扰的义理一目了然。

九、图与书——论易图现象

图画本质上只能再现事物的形象。其中所蕴含的抽象意义，往往只有少数具备专门修养的人甚至只有作者自己懂得。要让更多的人懂得，必须借助语言或文字加以解说；如果不借助语言、文字，就必须使图画自身的要素，如色彩和线条，固定、标准化。然而这样一来，图画就失去了个性，迈出了走向文字、符号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的产生，乃是由于人类为了表达抽象意义的需要。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无穷无尽的抽象思想，原则上不能借助图画表达。如爱、恨、道德、仁义、“克己复礼为仁”、“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道自然”、“存天理、灭人

欲”、“致良知”……，都不可能形诸图象。

由文字而形成书籍，人类获得的经验得以牢固保存、迅速积累、广泛传播。但是，在文字之旁，图画除了它的艺术功能以外，并未失去它传播信息的功能。有些信息的传达，简直是非借助图画不可。如天文、地形、器物形制、事件的场面。而在工程学中，从古到今，几乎无图就无法行事。所以那用文字写成的书籍，如有可能，就往往会配上图画，汉代的讖纬书又叫图纬或图讖，因为它们是配有许多插图的书。讖纬的内容大多荒诞，但那图文并茂的用心却是好的。

然而无论是色调和谐、线条流畅、维妙维肖、形神兼备的图画，还是仅用直线、曲线和圆组成的图形，都只能表达事物的形象。现在有人要用图画表达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们的思想，然而这些图画都必须配以文字，那传达思想的，实际上仍是文字。

易图所表现的，主要是《易传》的内容。而《易传》的内容，主要是抽象的思想，因而本质上无法用图象来表达。如易图中经常表现的“太极生两仪”云云，“太极”本身就无法表达。虽然不少人都把太极画成一个空心圆，但空心圆就是空心圆，它本身并不能象太、极二字组成的词，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硬要表示，就必加说明。既加说明，则空心圆就可去表示其他内容，如无极，如元亨利贞，如玄牝之门。最早创作太极图的周敦颐，就也用空心圆表示“万物化生”及“成男”、“成女”等等。

这样，那点、线、圆所组成的易图，就不能具有公认的意义。每幅易图的意义都是作者赋予的，所以几乎都需配以文字说明，而且往往仅能得到少数人的承认。即使那已具权威性的河图、洛书，也不断受到非议。至于那周氏太极图，就不断有人根据其图形，而赋予新的意义。

图形依旧，意义却全然不同。赋予它的意义，不仅因人不同，而且因时代不同。这些意义既非图象自身所蕴含，而是外来

的赋予，那就超不过赋予者从当时的语言文字中所获得的思想。

语言、文字也有自身的界限。虽然思维必须借助语言，但语言决不能表达思维的全部产品，特别是那些高级的产品。“道可道、非常道”的情形是存在的，所以中国古人才着意去追求文字以外的微言大义，才提出得意而忘言。

然而语言、文字毕竟有大量的声音和形象符号，所以它们的组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够表达高深而复杂的思想。而易图的创作，本意却在于把高深、复杂、灵活、多变的思想形式化。一旦形式化，随之就是简单化。人们只能赋予易图某些形式化的思想，易图也只能负载某些简单的、程式化的内容。所以，从思想的发展来看，易图起不到任何推进作用。王夫之严厉抨击邵雍的易图，原因之一就是他把灵活的思想内容束缚于某种程式之内，使之成为“典要”（《周易内传发例》）。

图象派赋予易图的思想，首先是取自《易传》，其次是在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中掇拾来的只鳞片爪。但是他们不能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对《易传》某些条文的图解，而要把易图说成是天神所赐、圣人所作，是整部《周易》的渊源。反对图象派的思想家，主要功绩，是揭露了易图的真正来源：图因易而作，易非因图而成。他们也有错误。如毛奇龄认为周氏太极图来自《上方大洞真元妙经》，黄宗炎说陈抟在华山石壁上刻有无极图，胡渭仅凭袁桷是“博雅君子”就相信《易三图序》所说为真，并进而断定，陈抟传给邵雍的图，就是阴阳鱼图。而且除欧阳修以外，几乎无人不信“河出图、洛出书”。所争仅在于：河图、洛书是否就是那些黑白点？但他们都一致指出：黑白点河图、洛书及其一系列易图，都是宋代及其以后的产物。

河图、洛书的问世是大量制作易图的发端，多数易图，都是黑白点河图、洛书的推衍。虽然在刘牧以前，北宋朝廷上下实际上都清楚河图、洛书并无其事，不过是神道设教；刘牧以后，反

对易图的呼声从未间断，而到清初则达到了高潮，但这些呼声并没有阻止易图的发展。主要原因当如朱熹所说：“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

中国古代社会和其他古代社会一样，宗教思想也是社会的最高思想，并且是哲学和其他社会思想的最后归宿。天、上帝及其所属神灵系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君主是承天受命，圣人是代天教化，也是不能怀疑的。河图、洛书既是经书所载，圣人所言，是帝王受命之符，是天赐与圣人的施教之根，当然不容怀疑。清代汉学家虽极力反对黑白点河图、洛书，但并不反对河图、洛书本身。他们甚至对欧阳修“河不出图”说还颇有微辞。只要河图、洛书本身是存在的，河图、洛书的图样就可以随意所造。而以河图、洛书为根据的易图也就会源源不断。

秦汉时代的易学相信观物取象说。但是，天文、地理、兽章、鸟文、近身、远物，到底取的哪一种？则难主一说。《说卦传》中，八卦象征的事物就达一百多种，汉代还有更大发展。圣人究竟怎样从这些物象中画出了八卦？则更是莫名其妙。而八卦和物象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捏造和附会。直到今日，当人们从观物取象说出发，企图去寻找八卦所据的某一物象时，仍然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所以程颐说，观兔子也可以画卦。这也就是说，任何物象都可成为画卦的根据。反过来则是：任何具体物象也都不能单独成为画卦的根据。义理派易学的兴起，与观物取象说的弊病有直接关系。义理派反对把精力浪费在物与象的关系上，主张努力去探求象、言之后、之中的意。

义理派重申了一个重要原则：天道自然。理学家们虽然否定了王弼引老庄解《易》，但接受了“天道自然”的原则。刘牧反对汉代易学家用天地之名数去附会大衍之数，而认为他创造的河图、洛书“皆合天地自然之数”，“数与象合，位将卦偶，不盈不缩，符于自然”。所以“非人智所能设之”（《易数钩隐图》）

卷下)。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但他们认为，理，乃是自然之理。朱熹正是以自然的原则看待先天方位，认为它的卦序及方位，皆自然而然，不假安排。

在哲学产生以前，人类以自己为参照物去塑造神灵。人间的君主喜怒无常，神的意志也多变难测。所以当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规律时，也就是对神意、甚至对神自身的否定。天道自然的原则与当时的科学进步有关，并且曾经是无神论思潮的根据。

但是只要人们需要神，神就决不会消灭，它只能随着社会意识的进步而改变自己的形象和功能。宋明时代，事物内在的规律不仅不否认神意，反而是神意之证明。它证明了神意的高明，“非人智所能设”。

“自然”原则在宋代，就是合乎规律、合乎内在逻辑的原则。用于易学，就是从一点出发，依照某种规则，能合乎逻辑地推出其他结论，朱熹支持河图，理由之二是河图与大衍之数合。合于大衍之数，就能用一套既定规则去解释卦象的产生，不必象汉代人那样一个一个物象地去牵强附会。卦象既有，则卦辞、爻辞、《易经》、《易传》都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完满解释。朱熹支持先天图，也是按照太极、两仪、一阴一阳的原则，得出的就是先天卦序。依先天卦序作成的卦气图，能较好地描述阴阳二气的周年运动，优于汉代传下来的卦气图。

图象派的错误，在于把这些图说成是天神所赐，圣人所画。这使他们遭到了许多攻击，也使他们赢得了更多的信奉者。加之他们对卦象产生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对阴阳二气的消长运动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描述，所以这些易图甚至赢得了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承认和支持。反对派尽管一次次地揭露易图的来源，但反对派不能根本否认圣人的权威，更不能否认人们对天命的信仰，甚至他们自己也保持着这种信仰。而他们在揭露这些易图渊源的同时，对卦象的产生又不能提供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往往又回到

陈旧的观物取象说。这样，他们也就无法根本阻挡易图学的潮流。

易图把易学的某些道理程式化、图象化，固然无助于思想的发展，但它使这些道理一目了然，能起到单靠文字所起不到的作用。从而使它赢得了修养不深，而又想了解一点易学知识的广大读者群。

学术需要创新。但汉代易学重卦象，王弼、程颐讲义理，都造诣极高，在这些方面要有所创新，非常困难。易图学的兴起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稍有灵悟，就可自立新说，而且自成体系，这种美好前景也吸引一大批文化素养不高、又想另立新说、一鸣惊人的作者。从而使易图学的创作队伍不仅历久不衰，而且越来越大，甚至浩浩荡荡。

不过，易图学虽然队伍庞大、著作繁多，但大而杂、多而滥，质量不高。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能用它来指导社会意识。所以无论在宋元还是在明清，易图学都不是易学的主流。因为作为学术，无论是关于自然界还是关于社会，都只有提供符合实际的新认识、新思想，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敬。把已经普及的知识改头换面，甚至披上神圣外衣；在已取得的认识之间倒因为果，吹胀甚至捏造、臆想它们的某些联系。即在当时，也将被有识者不齿；在以后，也必将成为过眼烟云。而这正是易图学的根本弱点。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全根先）

图7 吴澄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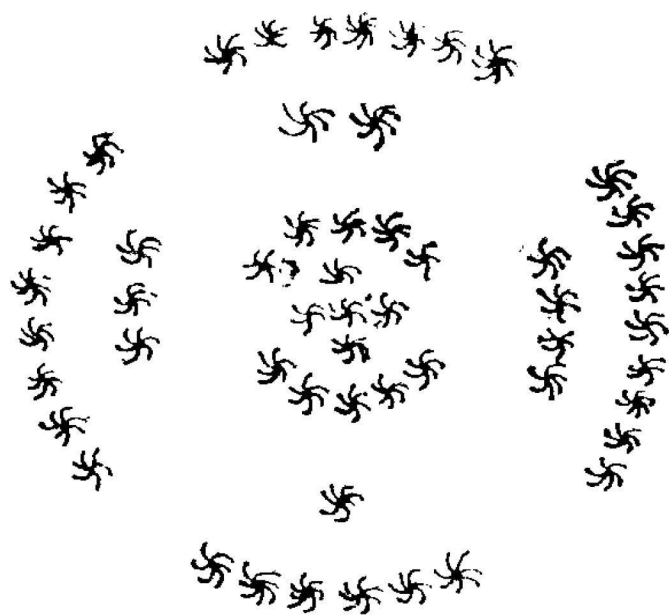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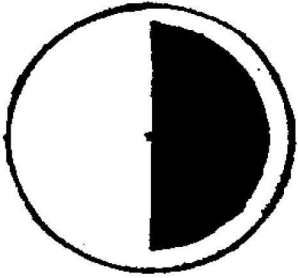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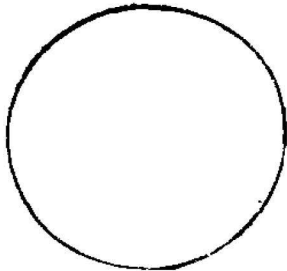


图8 吴澄洛书







易禪傳

法象第一

宋 林至 撰

太極者萬化之本也陰陽動靜之理雖具於其中而其肇未形焉故曰易有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奇耦之畫所自形也故曰太極生兩儀此太極一變而得之者也

图10、11 林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图

图12、13 林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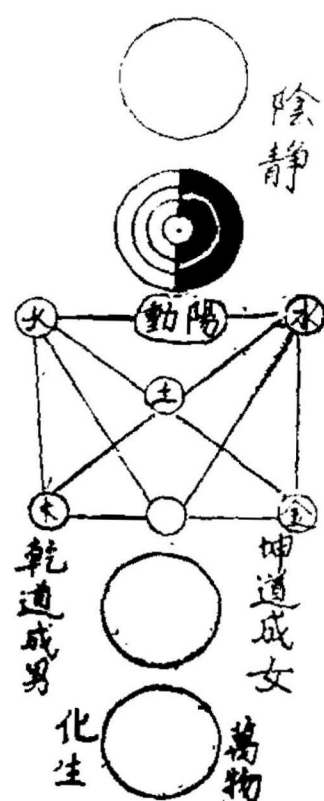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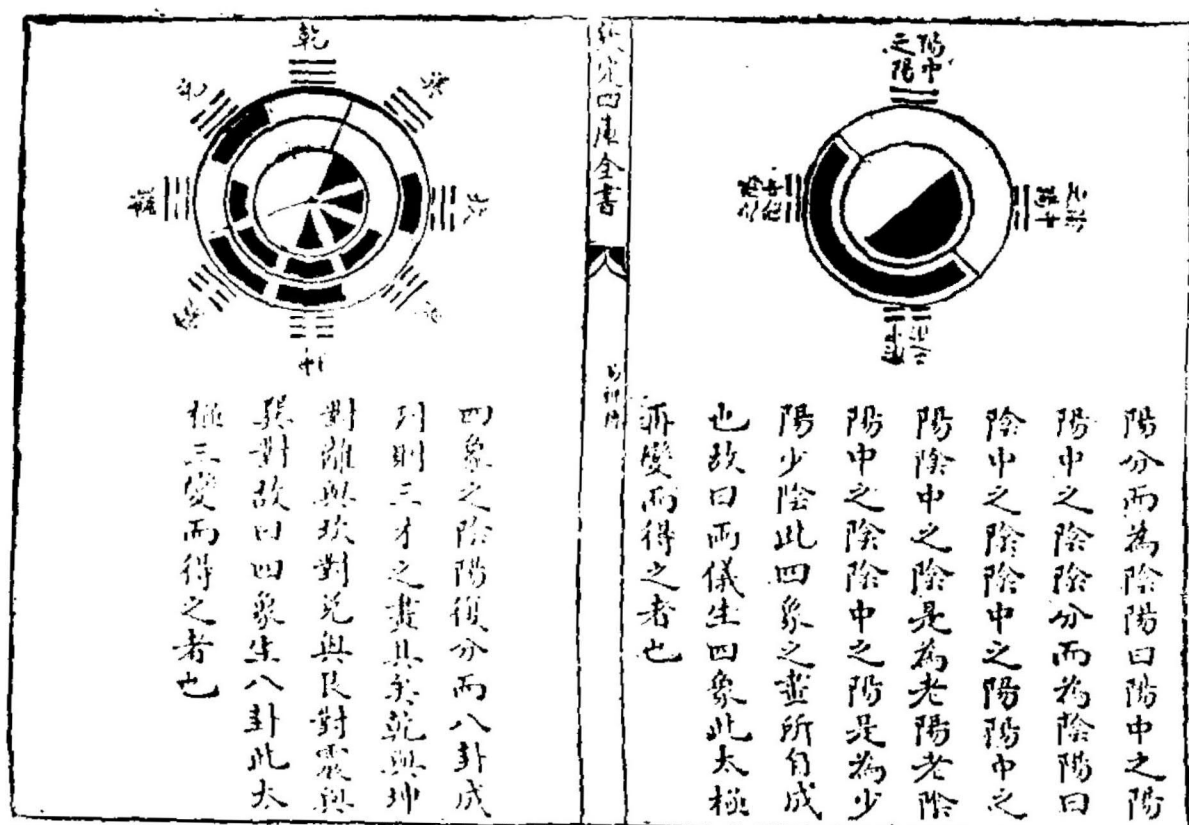


图14 宋·杨甲《六经图》
上载：易有太极图



图15 赵抃谦天地自然河图